



市井烟火

最后的车渡

□肖焕新

每座城市，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。车渡，就是重庆人挥之难去的记忆。

当年，主城区没有修建大桥之前，市民到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几乎全靠轮渡往返。而汽车过江则只能依赖车渡运载，车渡是汽车过江独一无二的交通工具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主城区两江上建起了很多座跨江大桥，车渡悄然结束了自己的使命，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前不久，我专门开车去北碚水土镇，只为看一眼主城最后一个车渡。

水土车渡建于上世纪60年代，迄今已有60多年历史。服务区是2019年新建的，主要为过往车辆和游人服务。车渡免费向市民开放，岸边的茶舍也不收费。江边巨石上雕刻的“陵江驿渡”四个大字，尤其引人注目。

登上服务区的一栋三层小楼，站在二楼落地玻璃窗前，看到的是整个车渡码头以及停在江边公路上等候过渡的车辆。

凭窗远眺，水土嘉陵江大桥钢索斜拉桥显得格外壮观，这是重庆主城区建设的第三十五座特大型跨江大桥，桥上行驶的车辆影影绰绰。

渡口告示栏显示：车渡每天的运行时间为7:30至18:30，早晚高峰每半小时一班，其余时间约一小时一班。

将汽车开上车渡，船上的调度要求把车排列整齐，车与车之间的缝隙尽量小，以便挪出更多的空间停车，这可有点考司机的手艺。车开上船停好后，码头上的乘客才徐徐登船。

嘉陵江并不是很宽阔，车渡航行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。大家很珍惜这观江观景的宝贵时光，都忙着用手机拍照，欢笑声洒落在淡绿的江面上。

站在甲板上，江风吹拂面颊，纵情饱览两岸田园风光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站在车渡崖上，江风吹起一段段历史尘烟。追溯重庆车渡历史，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，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。当时，有30多个国家在渝设了大使馆，40多个国家或地区设了办事处，连接东南亚战场的交通命脉中缅公路渝黔线直通重庆，大量的人流物流都要过江。“黄山官邸”在南岸黄山，各国政要上下山都要过车渡。那时，重庆主城区的车渡至少有十多个，海棠溪车渡是最主要也是最有名的车渡。

记得有次去市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中巴车早上七点多钟就等候在海棠溪江边码头，因浓雾锁江车渡无法启航，4个小时后雾散赶到会场时，只能无奈地与散会出来的人流汇合。

1966年上清寺第一座嘉陵江大桥通车，1980年石板坡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，才开始逐渐减轻车渡的巨大压力。

车渡，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它身上还承载了历史文化符号，现代文明与历史传承并不相生相克，国内不少地区已有很多保存传统历史的成功范例。正像留下一个音符，也能感受整首乐曲的奥妙一样。

夕阳照耀在嘉陵江上，江面泛起点点涟漪，我却陷在久久的沉思之中。

(作者系文史爱好者)

“野径行无伴，僧房宿有期。涂山来去熟，唯是马蹄知。”

白居易的《涂山寺独游》
真是写的重庆涂山寺？

□陈猷华

重庆涂山之巅的涂山寺，闻名遐迩，据说是重庆最古老的寺庙。寺中现有殿宇8重，房屋100间，占地1万多平方米，香火鼎盛，游人如织。

涂山寺简介说，涂山寺在西汉年间为禹王祠、涂后祠，庙宇供奉大禹和涂后的塑像……其后建禹王庙、真武寺(宫)。明万历九年，开始成为佛教寺庙。明清时期，寺庙有所扩大，真武寺(宫)因与禹王祠旧址合并，人们称为“涂山寺”。唐朝时，任忠州刺史的大诗人白居易曾写有《涂山寺独游》一诗。

那么，涂山寺到底得名于何时？白居易的《涂山寺独游》一诗写的究竟是不是重庆涂山寺呢？

不说南宋人王象之过重庆在涂山上看到的也还是禹庙。唐代的重庆涂山上，怎么会出现后世才有的涂山寺呢？

退一步讲，假设唐代重庆涂山上真有涂山寺，白大诗人也不可能“涂山来去熟”“唯是马蹄知”。白居易任刺史的忠州，距离重庆市区，现在高速路也有235公里，当时曲曲弯弯的步道应当在300公里以上吧，而且只能骑马或步行或坐轿，这么远的路程，怎么可能“来去熟”？白居易到忠州上任和离任回京，都是乘船从三峡出入，也没有路过重庆。再则忠州和渝州(重庆)分属不同的“道”(行政区划)，没有行政上的关联。白居易仅在忠州待了一年零三个月，他常年在长安(今西安)为官，长安郊外恰巧就有一座涂山寺，诗人闲暇时能常去游玩。由此来看，说《涂山寺独游》是写的长安郊外涂山寺，更合乎情理。

重庆涂山寺可能得名较晚

从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上记载的重庆涂山禹王祠，到宋代王象之看到的涂山禹庙，再到元代至正年间的《涂山碑》和明代万历乙亥年的《重建涂山禹庙碑》，然后是清乾隆王尔鉴《巴县志》上有关涂山和禹庙的诗文，不得不让人觉得涂山上承袭的庙宇一直是禹庙。甚至到了清道光廿一年(1841年)，划定涂山庙产的碑刻也是称其为“真武古刹”，而不说“涂山寺”。这块石碑现就立于涂山寺内，其碑文首句即云：“盖闻涂山真武古刹新置田土庄房山场。”

重庆涂山上的“涂山寺”，似乎得名很晚。《重庆真武山涂山寺及禹涂文化》上说，“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至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，道洪、正旭二僧历经苦心募化修建，逐渐扩大庙宇旧制。”僧道洪在明永乐年间苦心募化修建的庙宇，根据他是佛僧的身份，应当修建的是佛寺。吊诡的是，到了明万历甲戌年(1574年)，也就是僧道洪募化修建佛寺161年之后，人们看到的也还是禹庙的废墟，而不是健全的佛寺或者佛寺废墟。1575年曹汴撰写的《重建涂山禹庙碑》载：“于是于郡东涂山之麓，得禹庙旧址，与元臣刘志道所题庙碑马顾碑，漫缺不可读。”我们是相信近年编写的《重庆真武山涂山寺及禹涂文化》一书，还是相信明代人曹汴撰写的《重建涂山禹庙碑》？

前面所引“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至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道洪、正旭二僧历经苦心募化修建，逐渐扩大庙宇，这是在涂山寺简介中所说的明万历九年(1581年)广化寺与禹王庙及真武宫对换之后，这时候涂山寺出现，似乎是符合情理的。但若据清道光年间涂山庙产碑刻，1841年之后才会有涂山寺之名。

涂山寺到底得名于何时，由于资料缺乏，说不大清楚。但不管怎样，在古代，禹庙及后来真武宫、涂山寺所在的涂山，一直是重庆的最佳景区，游人首选之地。涂山古今都是观赏渝城“万户云为宅/双虹水作都”(王尔鉴诗)的极佳地点，而山上的寺庙则是游人极佳观瞻之地。

(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副主席)

唐代重庆涂山有无涂山寺？

按涂山寺简介所说，涂山上的禹庙已于明万历九年(1581年)与邻近的广化寺(老君洞)对换。王尔鉴编修《巴县志》是在清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五年(1751~1760年)，也就是说禹庙与广化寺对换将近200年后，涂山上的庙宇应该早已是寺院了，而且已改名为“涂山寺”。但诡异的是，乾隆时的诗人们仍然称涂山上的庙宇为“禹庙”。王尔鉴的《巴县志》上，既没有禹庙和真武宫与广化寺对换的记载，在寺庙卷也没有介绍涂山寺，诗文碑刻中几乎无人提及“涂山寺”，只是在“艺文志”卷末才录载了白居易的《涂山寺独游》。《巴县志》上，傅光宅、王尔鉴、施玉立、刘慈等众多明清时代官员乡绅描写涂山上寺庙的诗则直接以“禹庙”为题。而且，清康熙时巴县人刘慈的《禹庙》诗还有对庙宇的描述，其诗说：“朱甍绣柱临江渚/……玄圭陈锡忆当时/江流今古怀明德/览胜打碑读古词。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在王尔鉴当巴县知县的乾隆年间，涂山上仍然只有禹庙，而无涂山寺？

由清乾隆年间上溯，明万历乙亥年(1575年)在涂山上修建的庙宇，从当时镌刻的碑文《重建涂山禹庙碑》可知，当时重建的也是禹庙，而不是涂山寺。再往上，元代至正壬辰(1352年)，郡守费著主持重建的庙宇，也是禹庙。其碑“涂山碑”记述的是重建禹庙的原因及论证大禹娶涂山氏应是在重庆涂山，此碑与“涂山寺”无关。

从元代上溯至南宋，地理学家王象之所著的《舆地纪胜》提到重庆的涂山。宋理宗三年(1227年)，“象之过重庆，使黎伯撰方类次图经，谓：‘重庆之涂山，上有禹庙，则其为古之涂山也明甚。’”可见，南宋时，重庆涂山上的庙宇是禹庙而非“涂山寺”。

现今的涂山寺简介和陈思成主编的《重庆真武山涂山寺及禹涂文化》一书，均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有《涂山寺独游》为据，证明重庆涂山在唐代就有涂山寺了。

其实，白居易的《涂山寺独游》，本身就不能确定是写的重庆涂山寺，又怎么能当作证据呢？况且还是孤证。且